



Modern
Love

现代性爱的 中国形象简史

——中国现代爱情小说抽样分析

徐仲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编号：20070410839）

海南省重点学科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资助

海南师范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海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资助

Modern
Love

现代性爱的 中国形象简史

——中国现代爱情小说抽样分析

徐仲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爱的中国形象简史——中国现代爱情小说抽样分析/徐仲佳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07-08232-9

I. 现… II. 徐… III. 言情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9253号

责任编辑:李 珊

装帧设计:杨东人

现代性爱的中国形象简史

——中国现代爱情小说抽样分析

徐仲佳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232-9/K·975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言

为什么要为现代性爱勾勒形象史？

在这样一个举世滔滔的时候，选择性爱作为本书的关键词，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呢？平心而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这并不是本书写作的全部，甚至也不能说是重要动因。在这一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动机背后还有一些略微高尚一点的愿望存在着。

我记得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有一学生曾颇为感慨地说：“只有懂得现代文学的人过得才是人的生活。”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颇有些窃喜，感到此言大获我心。不过，回头一想又有些汗颜：中国的现代文学凭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尊荣？也许我可以引用郁达夫那句著名的断语来说服别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觉。”的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深湛的主题，个人的发现是它区别于此前任何时期文学的重要特质。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我们还会发现，现代个人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性爱叙事相伴随的。可以这样说，现代性爱的文学表现是中国现代文学人文主义传统中承载着个人主义思想的最重要内容。

那么，为什么是现代性爱叙事而不是别的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呢？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现代性爱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的权利：“性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性能带来巨大的肉体快乐；第二，性与人的自我有极密

现代性爱的中国形象简史
Modern Love

切的关系；第三，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的权利领域都不会忽视的资源，也正是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的领域，性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①因此，性的自由支配权的获得在现代人看来是人确证自己身份的重要表征。

其次，具体到现代中国，人的发现是从封建旧道统中脱身而出的。封建伦理秩序奉行的是尊卑长幼有序的等级制度。在婚姻问题上，家长意志代替了青年男女的自由选择。封建时代的婚姻在经常意义上不是意味着两情相悦，而是家族意志的反映。《礼记·婚义》：“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事宗庙”和“继后世”都是为了复制封建的等级伦理秩序。因此，封建时代的婚姻很少考虑青年男女的情感需求。这种情形在近代以来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恋爱自由观念的冲击。

现代性爱在中国的出现伴随于维新变法。虽然从晚明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就曾经冲击过旧礼教秩序的帷幕，但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士人，即使激进到要建立一种“情教”，他们仍然没有要求彻底解除旧礼教对个人的束缚，礼教秩序在他们心目中还是不可动摇的天理。中国人最早是通过那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文人好奇的眼睛认识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在那些早期的游历西方的游记、日记里记载了许多迥异于传统婚姻习俗的文明婚姻习俗，并把“男女自择配偶”视为“世界文明之极则”。^②而在戊戌变法的短暂蜜月期，维新人士从“强国保种”的目的出发，开始注意“性”的重要作用。西方的性科学在此期间进入中国，正是出于强国保种的需要：“保种之事，必先加意于女子，而女子尤以卫生为要，种类强弱胥关乎此”。^③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男女之异，非有他，在牝牡数寸之间耳，犹夫人之类也。”；“男女构精，特两机之动，毫无可羞丑，而至于人间隙也”；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在性问题上“……悬为厉禁，引为深耻，沿为忌讳，是明诲人此中之有至甘焉，故为客之秘之，使不可即得，而迫以诱之。”因此，他倡议要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性科学，对人类的性欲望加以导引：“中国医家，男有三

① 《李银河文集：性的问题·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2页。转引自梁景和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广智书局新书出版广告》，《中外日报》，1902年11月26日。转引自冈田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至,女有五至之说,最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费一生嗜好,其事乃不过如此如此……初无所谓淫也,更何论于断与不断,则未有不废然返者。”^①不过,此时谭嗣同的想法基本上还是限于强国的工具主义思考,把性视为人体机器的一种机能而已。在这种工具主义思想的支配之下,西方的性科学开始被介绍进中国。1901年西方的性生理学书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界,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这类书籍至晚也在1902年出现。^②

这种工具主义逻辑一直贯穿在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中。它虽然对于现代的性科学起到了传播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冲击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从晚清的新小说以及民初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的性爱叙事规范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就可以看出来。真正对国人性爱观念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是1918—1919年间,由周作人、胡适、鲁迅、蓝志先等人发动的“贞操问题讨论”,以及随后反映在问题小说中的对婚姻问题的关注。在这一次讨论中,性开始作为“人”的问题被提出来。现代性爱的观念通过这次讨论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随后在周作人的倡导下,现代性爱作为“人的文学”的主要内容进入文学创作之中。当现代性爱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出现的时候,真正的变革来临了。作者、读者从不自由婚姻的痛感中,从现代性爱的理论中汲取了力量,开始自觉到个人的身份意识。从此,中国文学开始了“辟人荒”的历程。

从《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到《或人的悲哀》(庐隐),大量对婚姻不自由所带来的痛苦的呼号显示着普泛意义上人的觉醒和女性的觉醒。程叔平的愤懑之语:“世间极苦痛的事,就是强不爱以为爱!”(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和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都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恋爱自由的观念和娜拉的榜样为

①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305页。

② 参见《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264~265页。

当时的青年人提供了精神的武器。他们把疯子(鲁迅《狂人日记》)^①和娜拉组合成自己的导师,勇敢地冲破旧礼教的束缚。

众所周知,从1915年开始,陈独秀们就在呼吁“伦理的革命”,但应者寥寥。而当青年们感受到“强不爱以为爱”的痛苦时,他们就敢于怀疑:“‘诗礼’!‘诗礼’!你有什么根据!你是不是人造的!……真狠……”^②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原本沉寂的伦理革命似乎在一夜之间应声如雷呢?这其中的原因来自人类的性本能对文明压抑的本能抗拒。当时,爱情苦闷的发泄是如此众多且同质,以致沈雁冰在文章中抱怨:“一般青年对于社会上各种问题还不能提起精神注意——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眼光还不能深入这些问题——而只有跟着性欲本能而来的又是切身的恋爱问题能刺激他们。”^③沈雁冰的抱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性在人的解放过程中起作用的关键:恋爱问题是青年们的切身问题。正是因为这种“痛切的实感”才引发了“人”的真正觉醒。觉醒的“人”很自然地就把叛逆的矛头指向压抑人性的旧礼教制度。与旧礼教决裂也就成为五四文学人文传统最核心的因素。应该说,叛逆的姿态能够成为五四整个时代的精神代表,性自由的追求居功厥伟。

在五四文学的“辟人荒”过程中,性自由的追求有灵与肉两个纬度,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就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④换句话说,五四文学中发现的个人是完整的人。《沉沦》(郁达夫)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人的性欲望毫不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郁达夫的真率大胆使得服膺旧性道德的士大夫感到“作假的困难”。^⑤不过,郁达夫小说中对人的生理欲望的大胆袒露并不意味着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性自由就是纯粹生理意义的欲望需求放纵。恰恰相反,人的生理欲望在五四时代其合法性必须与人的情感、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获得。在很多时候,在人的发现过程中,情感/理性带有更大的决定性价

① 傅斯年在《一段疯话》中说:“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转引自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② 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

③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④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

⑤ 陈子善编:《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郁达夫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5页。

值。涓生在说与不说中的两难以及他说出“真实”之后的悔恨,不就是那个时代最真诚的“人”的人性显现吗?

对于男性来说,对灵与肉相统一的性的追求是没有多少障碍的,他们的性与情与理性都很容易统一在个性主义的启蒙观念中。对于女性,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女性从有人类可以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受到性别的压迫。同样的性问题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境地。她们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没有经验,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她们所面对的是双重的困境:旧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抑。这两者有时是重合的,有时是交错的。当五四那一代女作家笨拙地从她们的同盟者——旧礼教的逆子——身边走开,打量着引导着她们走出她们父兄家庭中的异性时,她们敏锐地感觉到作为第二性的尴尬和痛苦。从《或人的悲哀》开始,她们试图以疏离于男性启蒙话语的话语方式传达新女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向外表现为对作为恋爱对手的男性的疑惧,向内则表现为性与情与理的激烈碰撞,总体表现为:“然而她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①

在五四那个时代,不仅社会没有给女性提供足够大的公共领域,而且绝大多数男性的性人格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检修。虽然也有一些男性启蒙者如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叶圣陶等人对女性的觉醒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男性社会的性别压迫有相当的检讨,但是绝大多数男性的性别自觉并没有达到时代的思想高度。因此,即使在郁达夫这样的激烈抨击着旧礼教的作家身上,中国传统的男权意识也还会从无意识的后门摸进来。这种状况导致了:从父亲的家门走出来的娜拉们痛苦地发现,五四的启蒙在把她们从铁屋子里唤醒的同时并没有为她们准备好合格的男性。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情感与理智相对抗的苦闷普遍弥漫在女作家们的作品中了。《海滨故人》、《何处是归程?》、《胜利以后》、《酒后》、《花之寺》、《洛绮思的问题》……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直到那个自命为“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的莎菲,也依然连一个简单的梦想——“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也无法实现。她的命运只能是,“在无人认识的地

^① 茅盾等:《作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让莎菲绝望的就是那些“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①。痛苦和绝望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露沙、洛绮思、莎菲、采茗们的痛苦与绝望恰是女性发现的标志:这种指向男性启蒙者的痛苦和绝望表明,女性开始作为独立的性别进行思考。由此,我们可以说,性是五四文学“辟人荒”的最有力的武器。它不仅使五四新文学发现了“人”,还发现了“女人”。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是第一次。

从此,性与情(灵与肉)相统一的追求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基本要素的观念成为五四时期开始形成的新的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它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参与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从19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中看到它的影子,也可以在革命时代“革命+恋爱”小说公式中发现醉心革命的青年们仍然无法对它忘怀。1940年代,在山河破碎的沦陷区,张爱玲、苏青、梅娘等女性作家在国是日非的时候也念念不忘它。即使在以后文学一体化的禁欲主义时代,它间或还能顽强地穿透意识形态的严密监视,透过体制中的些许缝隙流露出来。例如,在《青春之歌》初版本中,杨沫的体验式写作主要是表现在她对五四爱情编码秩序的不自觉承袭上。^②这是它受到责难,但也是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只是到了“文革”十年,主流文学创作才基本上是禁欲主义的世界。这种状况也是与当时整个文化界的极其严密的大一统专制相适应的。19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中“人”的重新发现也是通过恢复人的性与情的支配权利来完成的。1978年,像《爱情的位置》这样的社会学论文式的小说居然可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以致有人以为发生了政变。这种状况,今天看来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在那个民族悲剧刚刚结束的时代,却是能够反映出长期禁欲主义压抑之后反弹之强烈。而1985—1986年间,打破性描写的禁区又一次成为创作自由的标志,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等作品的出现。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这种相似反映的就是我们民族深处集体无意识的要求。

19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受挫并逐渐与意识形态合谋,一同落入流行文

① 《茅盾全集》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3页。

② 孙先科在《〈青春之歌〉的版本、续集与江华形象的再评价》(《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五四爱情编码与革命编码之间的罅隙以及被弥合的过程。

化(popular culture)的运作逻辑中。与此同时,文学中性叙事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一方面,性的叛逆性仍然是某些精英或先锋文学叙事的聚焦点。王小波在1990年代以自由主义姿态的写作就是一种意义明确的通过性描写来完成的“读神”行为。它也因此而成为测量当代文学思想深度的标尺之一;2001年左右,毕飞宇在《玉米》系列中对性与权力关系的解析也隐约表现出对王小波的文学精神的承继。另一方面,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被广泛接受,女性性意识的特异性也一再地被女性主义作家作为性别标签贴在自己的作品中。陈染、林白、残雪,她们的文学经验的传达通过性叙事已经明显地与男作家们划开了疆域。还有,流行文化的商品属性也越来越倾向于把性规训为具有伪个性面孔的供消费的“精品”。从《废都》开始,性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为融入流行文化的语码。《乌鸦》、《遗情书》等都曾经借助伪个性化的性描写获得了相应的成功。但是,在这些作品“成功”的过程中,人类的性几乎被退化成动物的本能需求。更可怕的是,即使是像王小波、陈染们的叛逆性写作也几乎无法摆脱被流行文化收编的命运。当他/她们被日益当作小众化的标志时,他们作品中的叛逆也是被消费着,而不是被接受着。在消费过程中,性的叛逆性只是以伪个性化的姿态而受到欣赏,其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要素则被弃置。在今天,五四以来的人文传统也正在逐渐被销蚀着。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能够较清楚地通过文本细读的形式,部分地展现中国现代性爱的形象史,本书选择了从《玉梨魂》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一共14个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试图从其中剔抉出中国现代文学经由现代性爱而开始“个人的发见”的历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限于体例和个人学养的限制,这一工作的完成还是粗疏的。

目 录

前言 为什么要为现代性爱勾勒形象史? / 001

第一章 新旧交替时代的矛盾与犹疑

——《玉梨魂》/ 001

一、“情天颠倒鸳鸯劫” / 001

二、止乎礼义的用情限度:新旧交替时代的选择 / 004

三、情、欲与自由:新旧交替时代的矛盾三角 / 008

第二章 性苦闷的大胆发露

——《沉沦》/ 017

一、“贞操问题讨论”:现代性爱观念的曙光初现 / 017

二、异邦他乡的性苦闷 / 021

三、自叙传的互文:大胆的自我暴露 / 027

四、枯槁社会里的一股春风 / 032

五、一点反思 / 037

第三章 直面启蒙的伦理陷阱

——《伤逝》/ 044

一、关键词:娜拉的出走 / 044

二、娜拉走后怎样? / 047

三、对启蒙伦理陷阱的反思 / 051

第四章 女性自我定义权的张扬

——《莎菲女士的日记》/ 061

一、丁玲之前的女性主义写作 / 061

二、莎菲:女性自我定义权的高扬者 / 064

三、消极自杀:莎菲的时代命运 / 070

第五章 才子佳人的现代传奇

——《啼笑因缘》/ 076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现代改写 / 078

二、道德叙事:才子佳人小说的旧衣钵 / 083

三、对《啼笑因缘》道德叙事的反思 / 088

第六章 传奇中的女子

——《倾城之恋》/ 094

一、一个传奇式的恋爱故事 / 095

二、传奇故事的颠覆叙事 / 098

三、乱世的人性探索者 / 104

第七章 一体化时代的双层叙事

——《青春之歌》/ 115

一、知识分子改造+爱情的双层叙事 / 115

二、体验写作与时代接受 / 125

三、一体化的修改:双层叙事的消失 / 132

第八章 劫难之后的诗意复归

——从《爱情的位置》到《爱,是不能忘记的》/ 135

一、爱情叙事的重新出现:“人”苏醒的标志 / 135

二、回到爱情本身:《爱,是不能忘记的》/ 141

三、社会学的争论:爱情的本质 / 148

第九章 性的政治性描写及其深层探究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小城之恋》/ 156

一、性的政治性描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56

二、原欲的深层探究:《小城之恋》/ 167

第十章 精英文化的溃败

——《废都》/ 179

一、沸沸扬扬炒《废都》/ 180

二、过界的性描写与细致入微的世情图 / 182

三、噱头还是艺术?

——关于《废都》性描写的争论 / 188

附录

权力与性

——《玉米》中的性政治 / 194

纯情+调侃+小资

——《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大众流行语码解析 / 204

思想革命的利器

——论周作人的性爱思想 / 212

参考文献 / 231

后记 一点遗憾 / 239

第一章 新旧交替时代的矛盾与犹疑

——《玉梨魂》

一、“情天颠倒鸳鸯劫”

当历史的大幕缓缓拉开的时候,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晨曦总是带着黎明时分特有的黑暗。在中国文学史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黎明,徐枕亚的《玉梨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觉,别署泣珠生、东海三郎等。1917年加入南社,曾为《小说月报》、《民权报》等刊物写小说,后创办《小说丛报》。《玉梨魂》是他的代表作,共30回,1912年起连载于南社刊物《民权报》,后出单行本,销数甚巨,影响也最大。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晚近长篇小说销行之广,当以此书为最”。^①

《玉梨魂》叙述的是一个凄侧哀怨的爱情故事。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何梦霞得戊戌变法风气之先,以最优等毕业于两江师范学校。由于父死而

^① 范烟桥:《最近十五年之小说》,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家道中落,何梦霞无力继续求学,不得不到朋友石痴(秦心)所办的小学任教。在蓉湖,何梦霞寄住在远亲崔氏门下,课余教授崔氏小儿鹏郎。梦霞处境蹭蹬,不免临风洒泪,对月哀怨。恰逢春末,梨花飘零,梦霞不禁起“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效林黛玉葬花之故技,以“青陵恨人”名义造“梨花香冢”。鹏郎之母白梨娘早寡,常在月夜哭于梨树下,看见梦霞所造“梨花香冢”,大有同感。因此,他们两人“虽未接一言,未谋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第三章“课儿”)

梦霞与梨娘两人虽“情芽怒茁,情思勃生”,但都避瓜田李下之嫌,不敢主动通问。一日,梨娘窥梦霞出门,潜至梦霞书房,携去梦霞所作诗稿《石头记影事诗》并遗一朵自簪之酴醾示意梦霞。于是,二人得以诗为媒互通知己之忱。(第四章“诗媒”)梦霞的朋友石痴东渡日本以求救国之道。梦霞因财力不济,空负一腔济世之志,只能“看人得意扬帆”,事后思量,不胜抑郁。受此刺激,梦霞借酒消愁。白梨娘深知梦霞的苦闷,劝他也乘此机会出洋游历,以展长才。梦霞因此更许梨娘为“生死知己”。此后,二人的感情急速升温:梦霞以情病酒,梨娘赠兰以劝其珍重。(第八章“赠兰”)

但当时封建礼教势力仍然炽器,形隔势禁,白梨娘格于礼法,不能与何梦霞定情今世,只能指望修来世情缘:“然窃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长对春风而唤奈何矣。……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诚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双修;来世情缘,何妨先种。彼此有心,则碧落黄泉,会当相见。与君要求月老,注鸳牒于来生,偿此痴愿可耳。”(第五章“芳讯”)。白梨娘的这种自我约束使得何、白二人虽同处一宅,却相见无因。白梨娘为谢知己,便赠梦霞一照片,“以寄一时爱恋之深情,即以留后日诀别之纪念。”白梨娘割断情缘守节的决心并没有割断何梦霞的情丝,梦霞反而要以终身鳏居为报。他甚至不惜承担“无后”的不孝罪名,抱定:“生既无缘,宁速死耳”的决心,“此后苟生一日,则月夕风晨,与卿分受凄凉之况味。”梦霞的痴情,让梨娘感到十分内疚。她认为自己以怜才而致两人“自陷情网”,“冤孽牵连”,使得梦霞“终日颠倒于情爱之旋涡中不能解决”。这不仅使梦霞放弃了“生人乐趣”,而且使梦霞陷入不孝的境地。她自责“薄命孤花,竟是不详之物,自误不足而误人,一误不足而再误”。为求从情天孽海中解脱,她甚至苦求一死。(第十章“情耗”)

正当梨娘为这场情缘苦病的时候，她的闺中膩友——小姑筠倩自学校归来。筠倩“肄业于鹅湖女校”，深受新学熏陶，追求结婚自由。筠倩假期归来，看到梨娘偃卧病床，遂婉转劝解。梨娘却忽然想到“一接木移花之计，僵桃代李之谋……以筠倩之年、之貌、之学问、之志气，与梦霞洵属天然佳偶。我之爱筠倩，无异于爱梦霞，就中为两人撮合，事亦大佳。梦霞得筠倩，可以相偿，筠倩得梦霞，亦可以无怨。我处其间，得以脱然无累，荐贤自代，计无有善于此者”。不过，从筠倩和梦霞的立场出发，梨娘既担心这李代桃僵之计干涉了筠倩的自由，又害怕梦霞鳏居之志坚，不肯相从。于是，梨娘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为国家惜才”的大义晓谕梦霞，要梦霞速遣冰人。梦霞得到梨娘的劝喻，一方面感到她“宛曲陈情，反复劝谕，辞严义正”，另一方面又感到违背自己誓言的痛苦。为了安慰梨娘，梦霞只得以缓兵之计含糊应付，借假期回乡省母。

当梦霞与梨娘都沉浸在进退两难的痛苦中时，他们的感情又遇到了一次“魔劫”。梦霞的同事李某窥得何、白二人的私衷，于何、白两人间传假信，试图骗取二人的私密函件以暴扬之。幸亏何、白二人情正，才不致上当。这一次“魔劫”使二人有了第一次晤面，也使梦霞自悔以前的鲁莽，对梨娘的李代桃僵之计开始被动接受，但其情死之决心也日益坚决。（第十九章“秋心”）

此时，秦石痴从日本归来，得知梦霞与梨娘的情缘以及梨娘的李代桃僵之计后，他认为梨娘的想法“二美既具，万恨全消”，因此，主动要求做冰人。奇怪的是，信奉婚姻自由的筠倩面对这一不自主的婚姻并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反对，反而被动地放弃了结婚自由的念头，长叹道：“嫂乎，妹零丁一身，爱我者惟父与嫂耳。妹不忍不从嫂言，复何忍故逆父意。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复有自主之能力。此后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缺减，而妹之心愿，则已尽付东流，求学之心，亦从此死矣。”（第二十二章“琴心”）梦霞从筠倩所唱的歌中得知这一婚事并非筠倩所乐意，因此大悔。但木已成舟，悔也无益。梦霞因此迁怒于梨娘，引得梨娘还其《红楼影事诗》以示绝情。梦霞得梨娘的绝情信后，五内俱焚。在焚掉诗稿之后，啮指出血，以血为墨，挥血成书向梨娘表示忏悔。梨娘看到梦霞的血书之后，深知梦霞的情痴，只得“权作温语以慰之。”以此，二人又有一次晤面，“以温存体贴之言，互相和解”。（第二十四章“挥血”）

梦霞年假回乡。梨娘得知梦霞对自己痴情未改,而筠倩也并不满意这门婚事,也自悔失计:本来希望李代桃僵可以三方都情得其所,不想梦霞情痴,使得筠倩“沦于悲境”。她求死之心又萌,试图以此来解决这一难题:“我死而梦霞之情亦死,或终能与筠倩和好。我深误筠倩,生亦无以对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节,成就他人之好事,则又大可死也。”此后,梨娘只求死以得解脱,“竟将瘦弱之躯,自加戕贼。”梨娘临死,以遗孤相托于梦霞,在祝福梦霞“孽缘有尽,艳福无穷”的同时,不忘梦霞深情:“瞑眩之中,不忘深爱,伏枕草草,泪与墨并。”(第二十五章“惊鸿”)在给筠倩的绝笔中,梨娘辩称:“此一死非殉情,聊以报妹,且以谢死者(指其死去的丈夫——引者注)耳”。同时,她又频频自责:把自己与梦霞的情缘称为孽根;一面自叹“为情所误”,一面又自幸“心虽糊涂,身犹干净”。(第二十七章“隐痛”)

梦霞得到梨娘的死耗,急急赶回蓉湖,却只能在“梨花香冢”凭吊。梦霞在梨娘死后“脱离情海,飞渡扶桑”,离开了筠倩。筠倩在经受了丧嫂失夫的巨大痛苦,尤其是看到梨娘给她的绝笔之后,也感到了无生趣,但求速死,于十日之内留下日记郁郁而终。不久,梦霞也痛感自己因情痴而“直遭凶灾到玉人”,致使筠倩“生前担个虚名,死后沦为孤鬼”,虽“不能即死以谢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谢余妻?”抱定死志的梦霞最终战死于武昌起义的弹雨之中。

《玉梨魂》的故事凄惨哀怨,正如时人所说:“情天颠倒鸳鸯劫,埋骨成灰恨未灰。”^①

二、止乎礼义的用情限度:新旧交替时代的选择

何梦霞与白梨娘的“情天颠倒鸳鸯劫”在叙述者看来,主要是何梦霞用情失当,不能自我克制用情的限度,使得原本为人伦之始的情变成了毒,葬

^① 陈惜誓的诗,《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0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